

09

聯合書院圖書館藏
資料室

一二九運動在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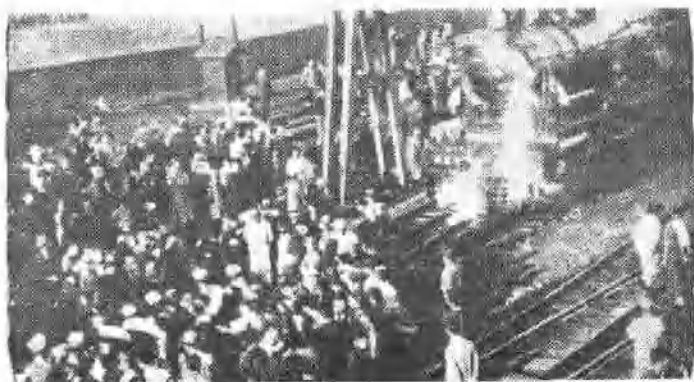
“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紀念

魏文伯

魏文伯同志為一二九運動五十周年題詞。



12月23日，復旦大學學生赴北站準備乘車去南京請愿。



上海各大中學校學生在北站堅持鬥爭。



12月24日，上海各界数千人示威游行，散发传单。



各界群众举行“上海市抗日救国市民大会”。



1936年1月，上海各大中学生组织救国宣传团，下乡宣传。

目 录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2)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刘少奇	(4)
一二九运动.....	(6)
一二九运动在复旦.....赵少荃	(7)
一二九运动在交大.....许锡璜	(12)
一二九运动在同济.....屠昕泉 刘作民	(19)
一二九运动在大夏.....余昕 郭敏 袁德齐 向枫	(24)
一二九运动在暨大.....陈伟达	(28)
不灭的火焰.....王槐昌 柯青	(32)
爱国女中的抗日爱国活动.....贾唯英	(36)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学生运动片断.....胡实声	(40)
请愿目睹记.....卢栋华	(43)
回忆一二九时期上海抗日救亡	
运动的发展..... <u>胡子婴</u>	(47)
往事重温.....魏璐琦	(52)
一二九运动中的上海中学联.....秦建君	(57)
一二九运动中的全国学联.....	
.....刘璈章 柳淑卿 秦建君	(61)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

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

(节录)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

毛泽东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

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队伍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中华报》，原题为“毛泽东同志演词节录”。

和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

(一九四四年在延安青年纪念

“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刘少奇

自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败后，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黑暗反动的时期，这个时期经过九年之后，除开在乡村中的武装革命运动外，在城市中又开始了带有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涨，那就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运动所直接引起的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进行的。

“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由此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救国运动才达到新的高潮，并一直继续到现在。虽然在目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政策的重新施行，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运动曾再度消沉，但这仅是部分的现象。所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尽管这个运动还存在一些缺点，但它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运动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我们现在所做的仍是实现“一二九”运动的基本口号：“一致对外”、“中国完全独立”。我们坚信这些口号与要求，

将要达到胜利。

“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由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到一九三七年“七七”，这中间有十九个月，在当时反动统治的城市中保持这个新起的革命运动不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是有一些困难的。但它是保持下去了。这首先是由于执行了一种谨慎的正确政策的结果。保持“一二九”运动所发动起来的学生群众的革命热情和聚积起来的革命力量，一直到一九三七年的“七七”，因为有了新的全国抗战的局面，才取得了广泛开展的条件。城市中的革命学生才能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和工农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因此，就使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多数青年，现在大部分已成为敌后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负责人以及经济工作、文化工作的指导者了。他们在今天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站在各方面很重要的岗位上，为他们在“一二九”的愿望而进行着很有效的斗争。相信他们不久的将来会以胜利者和主人的资格，回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骄傲地叫着“中华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这是他们在“一二九”时曾经叫着的口号。由此可见，单纯的学生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反动统治之下长期坚持。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

“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 二 九 运 动

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接着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察哈尔（今并入河北、山西），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竟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个卖国阴谋使北平的学生怒不可遏。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面前，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北平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敢地起来战斗了。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6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用木棍、大刀和水龙向学生们袭击，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三万余人，再次举行大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这一天，游行队伍遭到反动军警更残酷的镇压，有30多名学生被捕，近400名受伤。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又遭到镇压，激起了全国各阶层群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怒。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西安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形成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示威后，党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群众中去，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平、津学生立即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农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与此同时，党还在先进青年中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成为抗战爆发前后党在青年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在复旦

赵少荃

五十年前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成为全国抗日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潮的起点，并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上海，具有爱国反帝传统的复旦大学学生，勇敢地行动起来。

十二月十二日，复旦大学同学举行集会，致电北平各大学学生会，对北平学生爱国行动表示“万分同情”，主张：（1）反对华北自治；（2）讨伐汉奸殷汝耕；（3）青年应有救国的自由；（4）全国青年应一致响应北平学生号召，誓为后盾。十四日，复旦和其他大学一起，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同时发表通电，声援北平学生。

两次赴市府请愿

十二月十六日，郑通鹭、李广政等同学发起组织复旦同学救国会，虽然遭到国民党CC分子的捣乱破坏，但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进步同学的支持下，终于组成了救国会，并推选杨伯鹏同学等负责救国会的工作。十七日，北平学联派清华大学的韦毓梅（女）、陈元、燕京大学的陈翰伯来到上海。韦毓梅等人向上海各校学生代表介绍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要求支援。复旦代表回校后，于十九日召开全校同学大会，会上除介绍北平情况外，一位同学作了“报国有志、请缨无门”的讲演，另一位北平同学讲了自己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使得全校同学热血沸腾，决定一面联络其他学校，一面立即赴上海市政府请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被迫出来接见复旦、持志、同德医学院等校学生，答应将学生所提，“取消华北自治组织，释放北平被捕学生，惩办压迫学生运动的官吏，保障学生爱国运动，讨伐殷逆汝耕”等条件，如实转报中央，并以书面盖章签字，交与复旦同学。这样，

同学们便各自回校了。

在复旦等校同学赴市府请愿以后，国民党上海党部听说全市各大专院校学生将在江湾体育场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感到学生爱国热情是压制不了的，于是决定抢先行动，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使学生的影响尽量缩小。他们指使暨南大学的特务分子组织大专学校学生赴江湾新市区上海市政府“请愿”，同时具体规定：同学所走的路线为荒郊僻壤，时间在深夜，并且不准喊“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等口号。对于国民党的这一阴谋，暨大爱国学生骨干胡夏育、陈伟达等人研究，决定采用“将计就计”的办法，让国民党分子去组织，爱国学生也跟着参加。

暨大七百余名学生，会同交大、大夏、光华、大同、税专等高校爱国同学八千余人，冒着刺骨寒风，在漆黑的马路上由徐家汇步行，至凌晨三点多钟到达复旦，复旦同学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稍事休整后，复旦同学也和大队伍一起，再次赴市政府请愿。

直赴南京请愿

经过两次向上海市政府请愿，复旦同学感到这样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直接到南京去请愿，以扩大影响。

十二月廿三日上午十时，复旦救国会体育馆召开全体同学大会，会上一致同意立即赴京请愿，迫使政府抗日。于是四百多同学高举“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赴京请愿讨逆团”大旗，奔赴北火车站。国民党市政府事前得悉即派出大批军警沿途设置铁丝网、进行阻拦。复旦同学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中午十二时许终于到达北站，随即登上一时二十分开往南京的特别快车。但是上海铁路局接到国民党中央命令，将京沪、沪杭各次列车全部停驶。这时陆续到达北站的复旦同学已达八百余人。市政府调动军警包围车站，甚至派警察将同学拉离车站。但是，复旦同学坚决不回学校。他们表示“此次本校赴京请愿，其目的为反对变相的伪自治、要求政府立即动员讨逆，如不达目的，永宿北站，誓不回校。”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教育局长潘公展到场劝说学生回校，均无效果。

上海市长吴铁城遂将此事报告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蒋打电报给复旦校长李登辉，请李劝同学回校。李登辉被迫于下午三时许到达北站劝慰同学，同学们高呼：“拥护李校长！”，“请李老校长

回校休息！”仍然要赴京请愿。这说明复旦同学既热爱自己的校长，更关心祖国的命运。

复旦同学赴京请愿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晚暨南、大夏、沪江、光华、交大、持志等校同学均派代表携带面包、饼干、桔子等物品前来慰问，更加坚定了复旦同学的决心。东南医专的同学还冲破沿途军警的层层阻挠，赶来北站参加请愿。次日，暨南、同济、大夏、中国医专、上海法学院等高等学校，复旦实中、新亚、市北、武陵、建国等中学及黄花岗小学的学生也都列队前来参加晋京请愿的行列，学生总数达三千余人。

面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他们调集大批军警前来包围学生，宣布局部戒严，准备镇压。但是学生的爱国壮举，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国民党元老何香凝亲赴火车站慰问晋京学生，并挥泪作书云：“谨赠同情爱国之心，并请为国自爱。”她警告荷枪实弹的军警说：“不许向青年们打一枪”，“决不容许伤他们一个人。”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有所顾虑。

学生自己开火车

至此，京沪、沪杭两路火车，已停驶近三十小时。国民党当局另耍花招。下午四时半，公安局长宣布火车直放南京，愿去的同学立即上车。可是，火车开到青阳港后，司机即奉命离去。国民党原计划在此郊野，用武力胁迫同学回校。不料，复旦土木系一位广东籍同学曾在其父的煤矿里学开过小火车，这时毅然出来开车，车子终于慢慢开动了，同学们欢声雷动。

但是，国民党为了阻止同学前进，竟然派人拔去道轨铆钉，企图造成翻车事故。幸好铁路工人前来报告，同学遂将铆钉重新铆上。以后，国民党又遂段拆去铁轨，甚至把铁轨丢到河里。同学只得冒寒下水捞上铁轨，把铁路修复，继续前进。车到昆山，该站站长借了一部压道车给同学，让同学派人先行开道，以保证行车的安全。

二十六日晚上，火车刚过无锡不到十里，遇到一座铁桥，这里的铁轨拆得更多，迎面又停着一列三十八节的火车，宪兵司令谷正伦率领三团宪兵前来阻拦同学。宪兵们逮捕了学生代表和修路同学王拔山等人，并将列车团团围住，要同学返回上海。一时秩序大乱，同学们

纷纷下车，表示决不回上海。

二十七日凌晨，无锡丝厂工人来慰问同学，并送包子给同学吃，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沙千里、史良等人也来慰问大家。晋京同学便是在无锡市内举行示威游行。经过五天四夜的斗争，同学们都已精疲力尽，有的脚都肿了起来。同学们在无锡市内游行以后，到中南大戏院召开临时大会。但是同学们刚进去坐定，外边就被重重包围了起来。当时，国民党派了复旦毕业同学、行政院秘书长端木凯前来劝导同学回校。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坚持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释放被捕学生，然后才同意回校。国民党被迫放回了被捕学生。在宪兵的“保护”下，全体学生被送回上海各校。

这次晋京请愿，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使京沪铁路中断近一百小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同时在实际斗争中，也提高了同学的觉悟。

下乡宣传抗日救亡

同学们回校后，学校就奉令提前放假了。国民党放假的目的是瓦解学生救亡运动。但是，复旦许多同学却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利用寒假时机，下乡进行救亡宣传。

上海学生下乡队伍共约九十人，分为三个中队，其中复旦人数最多，单独组成第一中队，由裔寿民、史亚璋等同学负责。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捐款二百元、秘书长金通尹捐款五十元，以支持同学们下乡所需的印刷品经费。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复旦同学便在“上海各大中学学生救国宣传团”的旗帜下，由南翔向嘉定出发，沿途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讲解国内外形势，教唱抗日歌曲，张贴抗日标语，傍晚到达了嘉定。第二天清晨，抗日宣传团排队绕嘉定一周，向群众宣传后向太仓前进。在太仓，同学们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向各界募捐得款近百元。廿五日，同学到昆山宣传时，受到当地公安局长的恫吓和威胁，同学们和他们展开了说理的斗争，使他无言可答。在昆山，同学们向由十九路军改编的部队进行了宣传，在宣传队离开昆山时，他们还专门前来送行，高呼“欢送上海学生”的口号。

廿七日下午，抗日宣传队到达苏州。苏州城门紧闭，同学们翻过

城墙缺口，打开城门而入。后来苏州县政府派人招待同学住进苏州工专宿舍。二十八日凌晨，国民党派来大批军警，武力押送同学返回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复旦同学回校后，立即投入了纪念“一·二八”的活动。

坚决反击“三·二五”迫害事件

由于复旦同学积极投入一二九运动，站在运动的前列，影响全市，国民党政府对此十分痛恨，决定用武力来进行镇压，这样，就发生了“三·二五”事件。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上海市军警当局出动五、六百余人，包围复旦大学，并从校外宿舍逮捕学生救国会干部郑通鹭、江男俊、包毅、黄拔山、杨伯鹏、莫自新、蒋文蒸等七人，又派女探员乔春华到女生宿舍抓人，被同学发现后加以扣留。当天下午，大批军警冲入校内，逢人便打。当时，李登辉校长、金通尹秘书长、文学院院长余楠秋等人前往劝阻，亦被军警殴击。学生大怒，奋起反击，将军警全部逐至校外。军警遂在校外开枪，自己误杀警察一名，反诬复旦学生所为。幸好当时复旦学生邵素，冒充军警人员，拍有现场照片，使军警方面无从陷害。二十六日上午，军警当局借口校内有共党分子，藏有枪支，要求进校搜捕，结果一无所获。但军警仍然继续包围学校。对此，李登辉校长强烈抗议国民党的迫害和诬陷，公开声明：“复旦学生救国会始终与学校当局合作，他们主张急起抗战，这点本人亦深以为然。”积极保护救国会干部。

在李登辉的要求下，复旦大学校董孙科、钱新之、杜月笙、叶秉孚等人召开临时校董会，对军警当局扰乱学府、摧残青年、利用职权，混淆是非的行为，非常不满。会后，他们一起去责问上海市长吴铁城。吴见势不妙，承认发布新闻，诬指复旦学生枪杀警察是错误的，保证以后决不派军警进校搜查。上海各界救国会也多次发表宣言和意见，抗议军警围捕复旦学生。在各方面的反对和抗议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全体被捕同学释放。复旦大学的反迫害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一二九运动在上海交大

许锡璋

“九一八”之后，上海党组织遭受破坏，但是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等仍在继续活动。

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卫会）是一九三四年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号召而成立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武卫会不久就被迫转入地下，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党的一个秘密的外围组织，作为抗日救亡的领导力量之一在人民中秘密活动。徐昌裕和我是上海交大唯一的二名武卫会会员。当时，交大党组织已被破坏，一九三四年武卫会小组成立后，就成为领导交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组织了。

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的酝酿和发展

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武卫会在学生和店员方面的领导人杨成祺来到交大，在隐蔽的竹篱笆旁，同我们讨论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形势和上海交大响应这一运动的可能性，并商定响应的方案。当晚，在操场东侧的树丛里，我们召开了武卫会领导下的读书会成员会议。读书会的成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有正义感的同学，如钱保功、姜治光、夏锡钧、范元弼、叶佩兰、陈和英、周来芬等。会议决定，各自回到自己班里召开班级会议，并提议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成立学生救国会，对抗由CC特务把持的交大学生会，以领导交大的救亡运动。

会后，徐昌裕和我立即去找自动工程系乙组的班长王裕齐。徐昌裕把北平一二九运动浪潮波及全国和上海的情形，向王裕齐作了详细介绍，并且说：“最好由你出面召开一个全班会议，在班上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向全校建议召开全校代表大会讨论响应北平的运动；第二是由你提名我们两个担任我们班的代表，来发动这个运动。”王裕齐当场同意了我们的请求。当天晚上，我们分头在各班的宿舍活动。我在中院宿舍里碰到钱保功、姜治光，并知道钱已被选为化学

系一年级的代表，姜被选为物理系一年级的代表。后来，又了解到范元弼是机械系三年级的代表，夏锡钧是物理系三年级代表，陈和英是物理系四年级代表。

经过多方面工作，按照原定计划在工程馆一个大教室里召开了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会上，按照原定意图成立了交大学生救国会，以取代CC特务把持的御用学生会。救国会的委员是郑宣知、李震声、周世正、董寅初和我。郑宣知为救国会主席（后来才知道他是CC分子）。郑宣知所以被推为主席也是我同徐昌裕商量后在会上提出的，理由是郑宣知是土木系四年级学生，班级最高；他能演说，会写一手好文章，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表示过爱国，态度激昂；他反对学生会的CC头子杨训政（其实是伪装的）等。这时，交大同学中的两派斗争相当激烈。一方面读书会的成员，在各自的班级积极活动，商议如何响应北平的爱国运动；如何同上海各大学统一行动、如何召开全校大会发动罢课等；另一方面以杨训政领导的学生会，配合训育处陈嘉勋等也到处活动，为蒋介石辩护，说什么“政府对日抗战早有决心”、“要相信政府”、“不要受异党分子利用”等等。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救国会在校体育馆召开了学生大会。会上首先发言的是钱保功，接着是姜治光、夏锡钧、范元弼、徐昌裕和我。大家一致表示要响应北平和上海各大学学校的行动，要求交大立即举行罢课，参加上海市的示威游行。这些要求都为大会举手一致通过。

向江湾市政府请愿，蓝衣社破坏救亡运动

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徐昌裕通知我一起去上海税专找圣约翰中学的老同学胡实声。在税专的一间大宿舍里，胡实声告诉我们上海要成立一个地下学联，主要同CC把持的上海学联相对抗，交大代表就是徐昌裕和我了。当天，就在这个宿舍里召开了有税专、复旦、持志、光华、交大等十余所大学的代表会议，成立地下学联，由税专和复旦主持，组织大专学校的抗日统一行动。最后还决定发动一次大中学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我被武卫会指定为大中学校联络员，又被交大救国会指定为全

校学生宣传行动的总指挥。在复旦大学教室里，由地下学联主持的一次会上，决定于十二月下旬在江湾体育场召开全市各大专学校抗日救亡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

一切准备就绪。突然在预定行动的前一天傍晚（十二月十九日），交大校园里响起阵阵钟声，经久不停。同学们拥到操场上，只见暨南大学和其它学校来的学生数百人，列队在操场上喊口号、唱歌，说是要去江湾市政府请愿，钟是他们敲的。同学们自动来到操场，听候救国会的决定。救国会主席郑宜知很快在体育馆里召开了全校学生的紧急会议，决定和暨大同学一起行动。

突如其来的事件，打乱了我们的部署，原地下学联布置的统一行动，必将遭到破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没法搞清，与徐昌裕商量也来不及。为了挽回局面，我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发言：“暨南大学这个行动同我们预定的行动是不一致的，我们不能同意跟他们走。”当时会场里有人发出嘘声，企图制止我的发言。最后，我再次站起来，抢了一句：“我们坚决反对跟他们一起行动。”徐昌裕也站起来支持我的意见，会场里争论十分激烈。就在这个时刻，心怀鬼胎的郑宜知作了蛊惑人心的总结发言，并利用表决的方法，骗取群众跟随暨大一起行动。

于是，队伍跟着暨南大学同学，走到持志、税专，最后走到复旦，逢处敲钟，到处呐喊。我在队伍前后奔走，好不容易找到税专队伍的胡实声。听他说了一句：“我们上了蓝衣社的当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次行动，显然是蓝衣社预谋的行动，他们突然袭击，抢夺群众队伍，进行疲劳行军，使我们第二天的宣传活动遭到夭折。

我把胡实声的话，传给了徐昌裕。他沉默地点了点头，没有言语。队伍不停地前进，路上一片黑暗。徐昌裕在黑暗中，轻轻地说：“这样的行动，大家会认清蓝衣社的面目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队伍到达了江湾国民党市政府大楼门前。人们席地而坐，疲劳笼罩了一切，愤懑、懊恼在无边的黑暗中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这时，徐昌裕同我和钱保功、姜治光等商量，决定展开一次活动。徐昌裕在人群中说：“真倒霉，一夜疲劳行军，完全上了暨南蓝衣社的当，他们真狠毒，把人拖垮了，破坏了预定的计划。”